

“符号学”专题研究

后真相时代新闻求真的困境与出路

——基于符号现象学“真知”视角的思考*

张 骋

(四川师范大学 影视与传媒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8)

摘 要:在后真相时代,新闻求真将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造成这种困境的根源在于我们过去建立在“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基础上的新闻求真的路径在后真相时代已经不再适用。因此,我们需要重建后真相时代新闻求真的路径,这条路径应该从符号现象学“真知”视角切入,将新闻求真的过程视为在探究社群的基础上去寻找“真知”的过程,新闻求真应该是由多元新闻活动主体共同进行的永无止境的解释过程。

关键词:后真相;新闻真实;符号现象学;真知;探究社群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6431(2019)04-0130-06

DOI:10.13715/j.cnki.jxupss.2019.04.021

在后真相时代,新闻求真的问题必将又一次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因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当后真相时代将真相置于次要地位的时候,新闻求真将遭遇怎样的困境,困境的根源是什么,如何走出困境?

本文之所以要以符号现象学“真知”的视角分析后真相时代新闻求真的问题,是因为新闻求真本质上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新闻是新闻主体对客观事实进行认识的结果,而新闻真实的衡量标准就是看这个认识的结果是否与客观事实相吻合。在后真相时代,虽然新闻求真仍然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新闻真实仍然要以客观事实为衡量标准,但是新闻求真的路径已经发生了转变。我们过去追求新闻真实的路径已经失效,需要以符号现象学“真知”的视角重建新闻求真的路径。

一、后真相时代新闻求真的困境

后真相的核心内涵就是使真相变得不再重要,人们将根据自己的情感和信念,而不是客观事实,来做出选择和判断。因此,绝大多数新闻媒体都放弃了对真实的追求,追求的是情感的感染力和信念的影响力。可以说,在后真相时代,新闻求真会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具体说来,这种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

两个方面:

(一)“群体极化”导致对真相的漠视

所谓群体极化,是指“团队成员一开始即有某种偏向,在商议之后,人们朝着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47]也就是说,当观点相一致的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强化已有的观点,过滤掉不同的观点,最后导致群体意见的极端化。这种极端化的群体意见完全无视事件的真相,只依靠自己的情感和立场形成极端的观点。例如,在2017年3月引起大家广泛关注的山东聊城的“辱母杀人案”中,网民不了解事情的真相,并且也不愿意去了解真相,而是急于将自己归类为与受害者相似的弱势群体,认为事件受害者所受到的伤害就是强权势力对自己的伤害,所以网民几乎不假思索地站在弱势群体一方来表达自己的看法。这样的舆论所表达的不是对真相的追求,而是对自身焦虑和不满情绪的宣泄。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如2010年李启铭肇事案中的那句爆红的网络流行语“我爸是李刚”以及同年药家鑫案中给药家鑫贴上的官二代和富二代的标签,都与事实真相不符,都是由新闻媒体和网民的刻意炒作和情绪宣泄造成的。

* 收稿日期:2019-01-28

作者简介:张骋(1985—),男,四川成都人,博士,四川师范大学影视与传媒学院副教授,从事传播符号学、符号现象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当今中国文化现状与发展的符号学研究”(13&ZD123)

事实的真相是李启铭说出“我爸是李刚”仅仅是向警察表明自己的身份,药家鑫也不是富二代和官二代。但是这些事实真相并没有引起新闻媒体的关注和重视,也没有多少人真正关心这些事实真相,最后被集体记忆记录下来的,只是这些违背事实真相的舆论,而不是事实真相本身。每当有类似的事件再发生的时候,这些集体记忆就会被唤醒,记忆中的情绪和立场也同时会被唤醒,这些情绪和立场就成为人们做出事实判断的依据。

同时,互联网的出现和普及也是造成群体极化的助推器。互联网“赋权于民”的特征提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主动性和选择性。人们更倾向于接受与自己已有观点相一致的信息,过滤掉与自己观点不一致的信息。正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凯斯·桑斯坦所言“我们也不需要去预测,大部分的人是否只和志同道合的人讲话。当然,许多人会寻找不同的见解。但是,当科技能轻易让人自绝于他人的意见时,对个人和社会都是极度危险的。”^{[1] 61} 互联网就是这么一种具有排他性的科学技术,尤其是微信这种强关系的媒介技术使得人们很容易围绕某一话题或事件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具有高凝聚力的小圈子。这个小圈子内部的沟通与协商通常都是对已有观点的强化,在这个沟通与协商的过程中,少数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常常由于群体的压力主动或被动放弃自己的观点,这就导致在这个圈子内部缺少思想和观点的交流和碰撞,最终轻易采纳多数人的观点。这些多数人的观点往往也与真相无关,都是些“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一边吃着瓜,一边编发微信制造出来的,他们根本不关心事件的真相是什么,追求的只是情绪的表达与宣泄。

(二) “信任异化”导致对真相的不信任

所谓信任异化,是指信任不应该信任的,不信任应该信任的。前者在后真相时代表现为大量的谣言和假新闻由于迎合了人们的某种情绪和立场,人们不问真相地选择了信任;后者在后真相时代表现为对传统媒体和公共权力机构所发布的真相的不信任,这将导致公权力被污名化。这种信任异化将导致两个不信任真相的后果:

1. 舆情反转后的谣言认同;

舆情反转是指“随着事件的细节、过程逐步明朗,舆论焦点开始转移,网民质疑、批驳或同情的对象不断发生变化甚至反转。”^{[2] 33-35} 这种舆情反转的过程不是以事件的真相为基础,而是以人们固有的情绪和认知为基础,舆情反转的最后结果是舆论不

再信任事件的真相,转而信任各种表现性话语。2016 年底,舆论对“罗尔事件”的关注就呈现出典型的舆情反转的现象。我们首先来简单梳理一下“罗尔事件”的来龙去脉及其所呈现出的舆情反转现象:

2016 年 11 月 30 日,作家罗尔在其微信公众号上发表的两篇文章《罗一笑,你给我站住》《耶稣,请别让我做你的敌人》在微信朋友圈被疯狂转发,引起大家的广泛关注。罗尔在文章中声称,自己的女儿罗一笑不幸患上了白血病,已经住进了重症监护室,每天要花费上万元的医药费,自己出不起这个钱,请求广大网友的帮助。罗尔的这两篇文章得到了很多网友的同情和怜悯,在短短几天时间内,罗尔就收到网友多达 252 万元的打赏资助。然而,有网友爆料罗尔全家一共有 3 套房产,2 辆汽车,还有 1 家广告公司,罗一笑医疗费自付部分也仅有 4 万元,罗尔是个人品不佳的骗捐者。这个爆料的内容传开以后,很快舆情出现了反转,很多人严厉谴责罗尔的欺骗行为,认为自己的善良被人利用,但仍然有部分人坚持认为罗尔一家是值得同情的,至少孩子是无辜的。在整个舆情反转的过程中,几乎没有人关心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也没有多少新闻媒体真正去调查这些真相。大家认同的依据仅仅是自己的情感和信念,而不是事情的真相。

2. 走向网络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是政治学中的一个概念,它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将平民群众的利益视为所有政治运动和制度设计合法性的唯一评判标准。这种民粹主义思潮在刚出现的时候由于受到传播方式和传播手段的限制,影响力十分有限,但是互联网的出现使得这种民粹主义思潮的影响力大大提升,互联网自由、开放的特征让每个人都有了一个麦克风,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记者。因此,只要有一个“涉富涉官”的社会热点事件出现的时候,平民群众就会运用自己手中的自媒体,完全不问事实真相地支持弱势群体,甚至刻意散布谣言来制造官员与平民、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对立,加深社会矛盾。其导致的严重后果就是使公权力和传统媒体都陷入“塔西佗陷阱”之中,即当公共权力机构和传统媒体在辟谣的时候,不管传播的是否是事件的真相,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

最能体现网络民粹主义的典型案例就是 2013 年关于“李某某强奸案”的讨论。由于李某某的“名人”和“富二代”的身份,此案受到大家的广泛关注,

但在此案的审理过程中,关于李某某的各种传言在网上流传,比如李某某年龄造假、李某某过去强奸英语老师等。这些传言无一例外都是站在民粹主义的立场之上的。后来这些传言都被证实是与事件真相不相符的谣言,但是广大网民仍然不太相信事件的真相,更愿意去相信这些谣言。

二、困境的根源:新闻求真路径的转变

造成后真相时代新闻求真困境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社交媒体的兴起满足了每个人传播信息和表达意见的愿望,事件的真相往往就在这种众声喧哗中被淹没;又比如,作为传播者的网民由于自身媒介素养不高,事件的真相往往也被各种谣言所取代。但是,后真相时代新闻求真困境的出现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过去我们对于新闻真实的追求路径已经不符合后真相时代的要求,而我们又还没有真正建立起后真相时代新闻求真的路径。

过去,新闻求真的路径主要建立在两个认识论基础之上:一是理性主义;二是科学主义。

理性主义这种认识基础主要表现为理性认识比感性认识更可靠,更能认识到事物的本质。例如,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就是一个建立在个体理性推理之上的命题。他认为,知识的可靠性基础建立在理性之上,因为感性经验虽然能让我们认识到事物的形状和颜色,但是无法认识到事物的性质,只有理性才能做到这一点。笛卡尔之后,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理性主义哲学家都将理性视为一种天赋的高级认识能力,它能够使我们认识到事物的本质和普遍必然的知识。同时,休谟、洛克、贝克莱等经验主义哲学家虽然认为知识来源于经验,但是知识的最终形成还是必须依靠理性的判断。此后,康德认为理性构成个体认识的先验条件,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就是人的普遍认识能力作用于经验材料的结果。而理性中所具有的先天范畴就将这种普遍认识能力赋予每个人,理性的普遍性保证了个体认知能力的可靠性,也决定了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康德之后,黑格尔是最后一名理性主义哲学家,在黑格尔看来,理性是世界的本质规律,是世界上最普遍的东西,因此,理性也是事物现实性的评判标准。

另一方面,科学主义这种认识基础主要体现为以实验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得出的结论就是事物的本质。牛顿是科学主义的开创者,从牛顿物理学开始,物理学研究走上了一条通过观察和实验的方法来论证假设的道路。在牛顿之前,“所有的合格的科学家与差不多所有的哲学家,都从基督教的观点去观

察世界。”²¹⁹比如,身为哲学家和数学家的笛卡尔认为,所有的普遍性规律和数学定律都是上帝创造的;同样身为哲学家和数学家的莱布尼茨提出的“单子论”,也将上帝视为最高级的单子。然而,牛顿认为,一切知识的获得都是通过实验数据的收集、观察、分析、计算、归纳而得出。并且,这种依赖于数据、事实、数值的实证研究方法不仅出现在自然科学领域,还蔓延到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社会学、心理学、新闻传播学、经济学等人文社会学科都会用到量化研究的方法来论证自己的假设,进而得出相应的结论。

综上所述,“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都认为世界上存在绝对普遍的客观知识和真理,并且,人类运用自己的理性可以认识到这样的知识和真理。这种认识观在新闻求真的过程中主要表现为将新闻求真的过程视为单个的新闻活动主体运用自己的理性、运用科学的方法去探究事件的真相,进而实现新闻真实。不过,在后真相时代,这种以“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为基础的认识观遭了解构,建立在这种认识观之上的新闻求真的路径也不再适用,究其原因,有深厚的理论背景和哲学渊源。

率先对这种认识观进行批判的哲学家是尼采。在尼采看来,所谓的知识和事实,只是从某个特定的视角对事物做出的解释。世界上不存在客观的真理,只有出自认识者视角的解释,所有的“事实”和“真理”都是视角制造的;沿着尼采的思路,以狄尔泰、海德格尔尤其是后来的伽达默尔为代表的解释学认为,认识无法去把握某个绝对的真理,认识只是一种解释意义的活动,并且,文本的意义是开放的,随着解释语境的变化,它也处在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之中。因此,解释活动就是一项无限循环的任务。在后真相时代,这种理论思路表现为“视角制造真相”。例如,特朗普在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一再指控奥巴马执政时期对失业率的统计方法有问题,统计出来的失业率数据完全不可靠(奥巴马在2017年1月卸任时已将美国的失业率从就职初的7.8%降低至4.8%)。特朗普以自己的视角设定数据统计的标准,质疑了美国劳工统计局的统计标准,从而制造出美国的失业率高达35%左右的“事实”。但在特朗普上任之后,他又以美国劳工统计局的统计标准发布,截止2017年2月,美国的失业率已经下降到4.7%。由此可见,作为竞选者的特朗普和作为总统的特朗普,以完全不同的视角,制造出完全不同的就业率“事实”。

与此同时,在自然科学领域,这种认识观也遭到了批判,批判的源头也是对客观真理的怀疑。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推翻了牛顿力学,也就推翻了整个宇宙的客观标准,时间和空间都是相对的,都是相对于某个任意的标准而存在的。此外,客观物质是由看不见的电子构成,由于电子具有波粒二象性,我们无法直接观察电子,只能用电子观察电子,所以我们无法准确判断它们的性质,只能推断。德国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正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测不准定理”,就此宣告了确定性的客观真理是人类永远不可能达到的目标,也指出了建立在数据收集、分析、计算之上的量化研究的局限。在后真相时代,基于数据分析得出的结论往往不能反映事件的真相。例如,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之前,几乎所有的新闻机构和民调机构都预测希拉里将会当选总统,他们的预测都是建立在严格的数据收集和分析之上,没有半点弄虚作假,全部真实有效。但是,这次在真实有效的数据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与最终的结果却截然相反。然而,之前的美国总统竞选的结果基本上都符合绝大多数新闻机构和民调机构的预测。这说明不是新闻机构和民调机构的数据出了问题,而是在后真相时代,我们已经不能通过数据分析和归纳的方法获得事件的真相了。

由此可见,在后真相时代,当以“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为基础的新闻求真的路径不能得出事件真相的时候。人们一般就会放弃以外部的客观事实为真相的认识和判断标准,转而以内心的情感和立场为慰藉。前文所提到的“群体极化”和“信任异化”都是这种诉诸主观性原则的表现。但是,新闻求真的目标永远都是寻找事件的真相,新闻真实永远都要以客观事件为衡量标准。因此,在后真相时代,新闻活动主体仍然不能放弃对事件真相的追求,只是需要重建一条新闻求真的路径。

三、重建后真相时代新闻求真的路径:以探究社群为基础的真知

笔者在前文中反复提到:新闻求真永远都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因此,在后真相时代,新闻求真的路径仍然需要在认识论的范围内寻找。众所周知,所有认识的目的是为了寻找意义,而意义的产生离不开意识的意向性活动,这正是皮尔斯符号现象学关注的重点。符号现象学是“在符号学范围内思考现象学问题”^[4],“从当今的符号学(而不是现象学)运动的需要出发,重建符号学哲学基础”^[11],主要关注意识与意义生成之间的关系。在皮尔斯看

来,意识的主要功能就是获取意向对象的意义,而意义的获取也是意识的存在方式。由此可见,意义是意识主体与意识对象之间发生关联的中介。因此,意义必须是符号现象学意义上的真知。这里的真知是指真的认知,即“集中讨论认知或表述的‘真’品格,这种品格能引导进一步走向(客观规律的)真理或(事物本质的)真相。但是真知本身只限于描述意识获得的认知的品格。”^[237]换言之,真知不等于真理或真相,而是指追求真理或真相的品格。而意义必须是真知的原因是意识的意向性活动的动机就是获得真知,虽然这种真知是基于意识主体的主观判断。也就是说,意识不可能去寻找明知为假的意义,这种明知为假的意义实际上也就切断了意识主体与意识对象之间的关联。意识只会去寻找显现为真知的意义,不管最后能不能达到真知,追求真知的活动都必须贯穿意义活动的始终。否则意识的意向性活动就会失去目标,意义活动也就无法进行。

此外,符号文本必须包含真知,这是人们进行认知和交流的前提条件。因为符号文本存在和展开的基本动力就是为了寻找真知,没有人愿意得到一个完全为假的意义认知,也没有人愿意就一个完全不包含真知的问题进行意义的交流与沟通。正如皮尔斯所言“符号的目的就在于表达‘事实’,它把自己与其他符号相连接,竭尽所能,使得解释项能够接近完全的真,或绝对的真,也即接近真的每一个领域。”^[56]同时,皮尔斯符号现象学的真知观基本上属于“符合论”,也就是说,符号真知需要与客观事实相符合。但是,符号与客观事实之间不可能完全符合,因为符号与对象之间只具有像似性的理据关系,而像似性不同于同一性,像似性只是与对象的某些方面相符合,如果与对象完全符合就不是符号了。这种符号与对象之间的片面像似,就是符号真知。例如,我们可以用画像、照片、蜡像等符号来表现一个人,只要这些符号与这个人部分像似,这些像似的部分就是真的,其余不像似的部分不用考虑,因为所有符号与这个人之间只可能有部分的像似,不可能完全像似,如果完全像似,就是此人本人了,就不再是符号了。因此,符号的真知永远都是片面的、部分的、渐进的、不完美的,重要的是如何追求真知。并且,通向真知的道路可以是正确或错误的,我们需要找到一条正确的通向真知之路。

皮尔斯认为,这条正确的通向真知之路以探究社群为基础,是科学探究共同体协商对话交流之后的共识。这种共识并不是观点的完全一致,也不是

获得了所谓的真理,而是社群成员朝着真知的方向作永无止境的探究。这种探究是一种符号累加和衍生的过程,因为任何符号的意义都需要用另外一个符号来解释,而这个解释的符号又需要另外一个符号来解释,直至无穷。同时,由于死亡、无知、懒惰等原因,个人的解释可能会停止,但是探究社群的解释活动永远不会停止,因为探究社群是世代延续的,而且探究社群的符号累积不仅可以与自己先前的符号活动累积,还可以与社群内其他人的符号活动累积,这样就保证了符号的解释项呈现出无限衍义的状态。符号意义无限衍义的顶端就是真知。“社群真知的最大作用,是让个人和社群的意义活动朝真知方向行进,这就是真知的最终状态。真知就是一个朝着完美的目标挺进的‘真知过程’。”^[247]

笔者认为,在后真相时代,新闻求真的路径就应该借鉴符号现象学的真知观。因为新闻求真一直都是一个认识论问题,符号现象学本质上也是一个认识论问题,因为符号现象学主要关注意识的意向性活动如何从事物中获得意义。只不过与传统认识论不同,符号现象学的认识观不是建立在“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之上,而是在探究社群的基础上去寻找真知。

按照符号现象学的思路,我们应该像理解符号现象学的真知那样来理解新闻真实。正如前文所言,符号现象学的真知观属于“符合论”,即符号真知需要与客观事实相符合。因此,新闻真实的实质永远都是新闻报道要与客观事实相符合。虽然现在有学者提出了“建构真实”和“对话真实”等新闻真实观,但是,建构和对话只能是实现新闻真实的手段,不能是结果,新闻真实必须以客观事实为基础,否则就不是新闻了。同时,正如符号与对象之间只具有像似性,不具有同一性,符号真知也永远都是片面的、部分的、渐进的。因此,新闻真实也应该永远是片面的和过程性的。因为新闻报道虽然必须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但是“新闻报道只能是对事实的一种简约的、一定程度上割断的(一个事实非常复杂,报道只能选择一个角度来报道)、扬弃的(报道某一部分和忽略某一部分)、概括性质的报道。”^[248]所以,新闻报道只能也只需要对客观事实做片面的反映。比如,对于一场车祸的报道,我们只需要报道与这场车祸相关的重要细节(车祸的原因、车祸的后果、肇事司机和受害者及其家属的情况等等),其他与车祸无关的细节(树叶落地等)就不需要报道了。

同时,这种片面的新闻真实的实现也不是一蹴

而就的,有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并且永无止境。首先,客观事实本身在不断的发展,我们对客观事实的认识也在不断发展。我们对客观事实认识到什么程度,新闻真实也就实现到什么程度,并且,新闻真实的实现不是由单一的新闻活动主体完成,而是由多元的新闻活动主体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共同进行的。在传统媒体时代,新闻真实主要是由职业新闻活动主体来认识和建构的,不同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也主要发生在职业新闻传播组织内部,与社会大众的互动很少。不过,在新媒体时代,新闻真实是由不同类型的新闻活动主体相互作用和协商的结果,这些不同类型的新闻活动主体包括职业新闻人,普通民众、民间新闻组织等。这些不同类型的新闻活动主体就相当于组成了一个“探究社群”,这个探究社群内的不同主体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对客观事实进行解读,在解读过程中不断地修正过往新闻报道中的错误和失实,进而一步步逼近事件的真相并不断发现新的真相。这种新闻真实的探索和确证过程对于新闻求真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客观事件往往复杂多变,我们对于客观事件的报道很难一次性就寻找到事件的真相,并且随着事件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入,我们还可能寻找到更多的真相。如果我们因为发现最早发布的新闻有很多不准确和失实的地方,就轻易判定其为谣言而将其封杀,我们也就失去了发现更多真相的机会。

依托于不同类型的媒介形态尤其是自媒体,多元的新闻活动主体之间通过相互印证和澄清,可以形成一套自我净化和纠错的机制,最终呈现出事件的真相。这样的例子非常多:比如,2011年日本大地震引发的抢盐抵抗核辐射的谣言在网民们的相互交流和印证中被澄清;2015年8月20日,法国一辆火车上发生了恐怖袭击事件,我国对此事件的首发新闻几乎每个细节都有错误,后来也是在不断地纠错和改进过程中呈现出真实细节的报道。也就是说,只要我们能耐心一点,不要相信一次性就能接触到事件的真相,不要輕易地用自己的情感和信念去相信谣言,真相自会在人类的相互对话与交流中渐渐地呈现出来,并且我们还可能发现更多的真相。

四、结语

我们可以用狄更斯《双城记》里的第一句话来形容后真相时代新闻求真所面临的状况“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最坏的时代是指:在后真相时代,当真相被淹没,人们不再根据客观事实,而是以自己的情感和信念来做出选择和判断的

时候,新闻求真会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最好的时代是指:在后真相时代,当我们以符号现象学“真知”的视角重新找到新闻求真的路径时,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机会接近事件的真相,更有机会发现更多的真相。因为当我们把新闻求真的过程视为在探究社群的基础上去寻找真知的时候,新闻求真将是一个由多元新闻活动主体共同进行的永无止境的解释过程,这将更加有利于新闻真实的实现。因为过去新闻真实实现到什么程度,完全由职业新闻活动主体决定,这极大地束缚了新闻真实的实现程度。而现在当新闻求真是由多元新闻活动主体共同完成的时候,任何人想要故意遮蔽事件的真相,都是不可能的事,不同的新闻活动主体总会继续去追求事件的真相。并且,这种追求真相的过程将永无止境,因为探究社群对于客观事件的解释永远不会停止,每个真相下面总会还有个真相在等待我们去追寻。

参考文献:

- [1] [美] 凯斯·桑斯坦. 网络共和国 [M]. 黄维明,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 [2] 李良荣. 传播革命下“新解释框架”建构 [J]. 人民论坛,2015(7).
- [3] [英] 丹皮尔. 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 [M]. 李珩,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75.
- [4] 赵毅衡. 意义理论,符号现象学,哲学符号学 [J]. 符号与传媒,2017(15).
- [5] 宗争. 符号现象学何以可能 [J]. 符号与传媒,2017(15).
- [6] 赵毅衡. 哲学符号学: 意义世界的形成 [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
- [7] [美] 皮尔斯. 皮尔斯: 论符号 [M]. 赵星植,译.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
- [8] 陈力丹. 论新闻真实 [J]. 中国广播,2011(4).

责任编辑: 万莲姣

The Difficulties and Way Out of Seeking Truth of News in Post – Truth Era —— Conside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ue Knowledge” in Semiotic Phenomenology

ZHANG Cheng

(College of Movie and Media,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In the post – truth era, news truth seeking will encounter unprecedented difficulties. The root of the difficulties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 way of seeking truth in news based on Rationalism and Scientism in the past is no longer applicable in the post – truth era. Therefore, we need to rebuild the path of seeking truth from news in the post – truth era. This path should star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ue knowledge” of semiotic phenomenology. The process of seeking truth from news should be regarded as the process of seeking “true knowledge” on the basis of exploring community. Seeking truth from news should be an endless explanatory process jointly carried out by multiple news subjects.

Keywords: post – truth; news truth; semiotic phenomenology; truth knowledge; exploring community